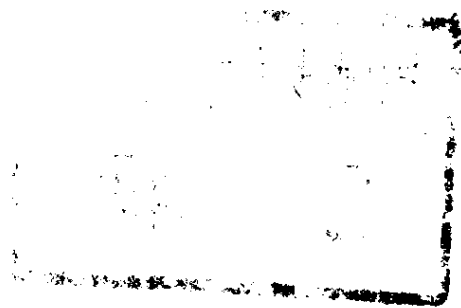


宁波帮 企业家的崛起

浙江人民出版社

宁波帮 企业家的崛起

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九辑



浙江人民出版社

宁波帮企业家的崛起

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39辑

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插页2 印张8.75 字数22万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5,300

ISBN7-213-00320-8/K·70 定价3.40元

71/54/06

前 言

“宁波帮”，泛指旧宁波府属鄞县、镇海、慈溪、奉化、象山、定海六县在外地的商人和企业家群体。“宁波帮”作为一个商帮，大致开始形成于明末。崇祯年间，北京就有鄞县会馆之设。五口通商以后，“宁波帮”开始崛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以后，趋于鼎盛。“宁波帮”是我国近代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他们对我国经济的近代化发展作出过不小的贡献；在今天，遍布世界各地的“宁波帮”对我国四化建设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浙江省政协文史编辑部经多年努力，征集整理了一批有关“宁波帮”的史料，现在先编辑出版《“宁波帮”企业家的崛起》（《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39辑）一书。接下去还将继续出版有关的史料专辑，它们连同两年前所出的《浙江籍资本家的兴起》将逐步形成浙江经济史料系列丛书。

在这本《“宁波帮”企业家的崛起》中，我们刊载有关于“宁波帮”的综述性分析文章和史料4篇：林树建写的《“宁波商帮”的形成及其特色》，考察了它的形成环境和形成过程，所经营的主要行业，并与“徽州帮”作了比较研究，分析了它的特色。陈立仪在《上海的“宁波帮”》中，探讨了“宁波帮”在其最大的活动基地上海的崛起过程和原因。董启俊提供了宁波旅沪同乡会这一最大的同乡会组织的历史资料。张章翔在《在天津的“宁波帮”》中论述了严信厚、叶澄衷等代表人物在天津的活动情况。这样，“宁波帮”总的历史面貌大致勾画了出来。

本书以人物作为重点。首先载有在“宁波帮”崛起时曾起过某种开创作用的代表人物传记5篇：严信厚，由于他创办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创立第一个商会组织——上海商务会议公所，并创办第一批民族工业——通久源轧花厂和纱厂，而被视为近代“宁波帮”企业家的开路人。沈雨梧所写的严信厚传记，对他的一生作了迄今最翔实的叙述，并纠正了旧说中对他的生卒年月的错误记载。叶澄衷，原先是一个黄浦江上摇舢舨的小人物，从经营火油、五金到沙船、钱庄，又到创办丝厂、火柴厂，从上海到天津、武汉以至全国各地，成为积资800万的大富豪，其能量之大十分惊人，可说是老一代“宁波帮”的典型。朱葆三和虞洽卿，一向被作为“宁波帮”两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而并提。虞洽卿因在《浙江籍资本家的兴起》中已作详细介绍，这里不再重复。朱葆三，也是个尚有争议的人物，在陆志濂所写传记中对他作了实事求是的评述。还有一个宋炜臣，因缺乏翔实史料，本书仅介绍了他的简历。此外，“宁波帮”银行家如宋汉章、秦润卿等的事迹，在《浙江籍资本家的兴起》中亦已有所论述。

家族血缘关系，是构成“宁波帮”群体的核心因素。镇海方介堂家族和李也亭家族，是两个典型的家族。汪仁泽、王遂今所写的这两家的家族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个“宁波帮”成长、发展的历史。方氏以商业起家，李氏以沙船业起家，而都以钱庄业致富，后来又都向近代工业发展，在早期“宁波帮”代表人物中，均占有重要的地位。

趋于鼎盛时期的“宁波帮”更是人才辈出，而其创业活动多与抵制外货、挽回利权的斗争相联系。本书所载这一时期的14篇人物传记中，如刘鸿生，为了发展民族经济，连创十多个企业，而有“企业大王”之称，表现了他在开拓创新上的雄才大略。又如项松茂，因以名牌产品固本皂压倒英货祥茂皂，挽回利权而久享盛誉，又因坚持抗日，不畏强暴，为国献身而永垂英名。其他

如陈万运、余芝卿、李康年、竺梅先、金润庠、俞佐庭、董延芳、盛丕华等等，也都有艰苦创业、顽强开拓、热爱祖国的表现。以这些人物为代表，足以反映“宁波帮”作为一个企业家群体所特有的风貌和素质。

“宁波帮”企业家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崛起的。他们每走一步都会遇到荆棘和陷阱，但他们冒险犯难，艰苦创业，卒底于成。他们所体现的开拓创新精神是很可贵的，至今还在活跃于港澳和海外的当代“宁波帮”企业家身上熠熠发光。当前，我们在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的道路上，这种精神是很值得借鉴和汲取的。

本书主要在于提供史料，希望它对读者和研究者有所助益。书中缺点和错误，尚望不吝指正。

本书主编王遂今，审定叶炳南、梁则圣。在编辑过程中，承蒙上海社会科学院丁日初研究员和该院经济研究所同志给予热情关怀和指教；并得到浙江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浙江省历史学会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谨致谢意。

编 者

1988年6月6日

目 录

前 言

“宁波商帮”的形成及其特色·····	林树建(1)
上海的“宁波帮”·····	陈立仪(24)
宁波旅沪同乡会·····	董启俊(40)
在天津的“宁波帮”·····	张章翔(51)
为“宁波帮”开路的严信厚·····	沈雨梧(65)
“五金大王”叶澄衷·····	朱文炜(72)
叶澄衷及其办学事迹·····	周克任(77)
朱葆三的一生·····	陆志濂(80)
汉口头号商人宋炜臣简历·····	武 志(94)
镇海柏墅方氏家族史·····	汪仁泽(95)
两度主持上海总商会的方椒伯·····	(103)
中国化学工业社创办人方液仙·····	(109)
镇海小港李氏家族史略·····	王逸今(123)
“企业大王”刘鸿生·····	陆志濂(132)
颜料买办周宗良·····	卢书镛(157)

长袖善舞的黄楚九……………谈玉林(166)

抗日殉身的爱国企业家项松茂……………汪仁泽(177)

赵家蕃、赵家艺兄弟……………陈觉民(192)

大中华橡胶厂创办人余芝卿……………汪仁泽(195)

三友实业社与陈万运、沈九成……………陆志濂 陈立仪(201)

中国国货公司与李康年……………沈雨梧(212)

创办民丰、华丰造纸厂的竺梅先……………竺培农 竺培德(217)

重振民丰、华丰造纸厂的金润庠……………金志朗(231)

俞佐庭——从宁波商会会长到上海市总商会主委…宋紫云(239)

俞佐宸小传……………陈惠炳(247)

黄延芳——热心救济事业的爱国实业家……………汪仁泽(249)

致力民主运动的盛丕华……………汪仁泽(256)

“宁波帮”是在什么条件下崛起的……………王遂今(266)

小资料

孙中山论宁波和宁波人(39) 美领事眼中的宁波轧花厂(50) “宁波帮”机器工人和木工(131) “宁波帮”中的银行家(246)

“宁波商帮”的形成及其特色

林 树 建

所谓商帮，是以乡谊为纽带连结而成的组织松散的地方性商人集团。“宁波商帮”，是指旧宁波府所属鄞县、奉化、慈溪、镇海、定海、象山六县在外地所形成的商人集团。本文拟就“宁波商帮”的形成环境和形成过程，活动地域和经营行业，特色及其与“徽州商帮”的异同等问题，作一综述和分析。

一、“宁波商帮”的形成环境和形成过程

(一) 地理环境 宁波从事经商活动，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它地处东海之滨，居全国大陆海岸线中段，海道辐辏。《宁波府志》称：“宁郡六县，俱皆滨海”，“西南自岭粤，东北达辽左，延袤一万四千余里，商船番舶，乘潮出没”，“内则联络众省，外则控制东倭”，“有鱼盐市舶之利，实东南之要会也”。由于“宁波地处海滨，居南北洋中间，过去南北洋往返的船只，往往以宁波为停泊站，并以其所运载的南北各地物产与宁波土特产交换，这样就导致了宁波、慈溪、镇海一带商人创设南号与北号，自行置船装运”^①，形成南北号行业。特别是宁波与上海一苇可航，宁波商人

鹭趋上海，故宁波商帮在沪势力特盛。

宁波不仅海道辐辏，而且河道和陆路交通也很方便。唐宋时期，通过甬江、姚江和浙东运河，渡越钱塘江，与大运河沟通，可货运全国各地。至于近代沪杭甬铁路建成后，与各地联系就更见便捷了。

(二) 历史环境 宁波秦时称鄞，早在秦代以前已有近海岛屿上的渔贩盐商和滨海地区的商贩来这里集货贸易。《乾道四明图经》曾载：“鄞山……以海人持货贸易于此故名。而后，汉以县居鄞山之阴加邑为鄞”。晋时“商贾已北至青、徐，南至交广”，“唐宋市舶，遥达海外”^②。宁波一直是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陈裕菁译订的日人桑原鹭藏《蒲寿庚考》中说：唐代“福州、明州（即今宁波）、温州，以及苏州之松江等，皆贸易港也”^③。又据日人木宫彦泰说：唐时，泛海兴贩的中国商人“南路照例从明州出发（即从福州或台州开出的船，一般也先到明州停泊），横渡东中国海，到达值嘉岛，从此再进入博多津。”大商人李邻德、李延孝、张支信、李处人、崔铎等，都自备船舶，往返于日本与浙江明州、台州、温州诸港^④。宋代，开赴日本、高丽的商船也大都在明州放洋。《扶桑略记》载，白河天皇承历四年（1080年）闰八月，宋商孙忠曾带明州牒文，进入越前敦贺港^⑤。去高丽经商的明州商人，有名可考的，如宝元元年（1038年）有陈亮等147人；崇宁二年（1103年）又有杜道济、祝延祚等到高丽经商，并留居高丽^⑥。元代，庆元（即今宁波）古江厦码头改称下番滩码头，“番货海错，俱聚于此”。定海（即今镇海）也系“蛮夷诸番舟帆所通，为一据会总隘之地”^⑦。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政府厉行海禁，宁波的合法海外贸易一度停滞，而走私贸易异常活跃。嘉靖年间，通番者已“不可数计”，甚至“极远之物，皆能通之”^⑧。“鄞县人毛海峰、徐碧溪、徐光亮、叶宗满等”，经常“装载硝黄、丝绵等违禁诸物，抵日本、暹罗、西洋诸国互市”^⑨。日人中村新太

郎说：明代日本对华贸易，“在特许贸易之外，商人们私下贸易也很盛行。主要的途径是在宁波通过明朝人做为掮客来进行交易”^⑩。清代康熙二十三年开海禁，三十四年“分设浙海关署于宁波、定海”^⑪。荷兰、英吉利等西欧商船鸞趋定海，云集宁波。夏燮《中西纪事》曾载：英商在“台湾隶入大清版图”后，“时来往于浙之舟山、宁波等处”。《皇朝文献通考》也载：“外洋红毛诸国番船”，“至宁波者甚多”。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一年之内，来定海的英国商船就达10艘^⑫。这正是《南京条约》英国侵略者要求辟宁波为通商口岸和鸦片战争后不少宁波商人充当洋行买办掮客的原因之一，也是构成宁波商帮特色的重要历史因素。

宁波是滨海港口城市，因而古代宁波商人主要从事海外贸易。但在国内各地经商的也非少数。这里举几个古代著名的大商人：

宋代的张云衢，“起家货殖，结约徽商，同客维扬，遂以资雄一乡，称封君焉”^⑬。

元代的倪恣也是一个能左右米市的巨商。《鄞县志》载：“倪恣使人贾泉州，得米盈巨舰，米商随而至者六十余艘，价腾踊，恣故损其价，群商恨之”。

特别是明朝厉行海禁，在日趋繁荣的商品经济的驱使下，商业资本为了寻求出路，宁波商人除了铤而走险，进行海上走私贸易外，纷纷转向内地贸易，这时在内地经商的宁波人渐多。如明代万历年间开设的孙春阳南货铺，是苏州数百年老店，这家“天下闻名”的南货店，就是宁波人经营的。清钱泳《履园丛话》载：“苏州皋桥西偏，有孙春阳南货铺，天下闻名，铺中之物，亦贡上用。案春阳，宁波人，明万历中，……为贸迁之术，始来吴门。……其为铺也，如州县署，亦有六房：曰南北货房、海货房、腌腊房、酱货房、蜜饯房、蜡烛房。售者由柜上给钱，取一票，自往各房发货，而总管者掌其纲。一日一小结，一年一大

结。自明至今已二百三四十一年，子孙尚食其利，无他姓顶代者。吴中五方杂处，为东南一大都会，群货聚集，何啻数十万家，惟孙春阳为前明旧业，其店规之严，选料之精，合郡无有也。”

明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宁绍盛科名逢掖，其戚里善借为外营，又佣书舞文，竞贾贩锥刀之利，人大半食于外”。《广志绎》成书于明代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可见明万历前宁波人外出经商者已为数不少，明末宁波商帮的崛起并非偶然。

（三）形成过程 （1）初始形成阶段 如前所述，宁波人外出经商古已有之。而结成商帮，则是明代末年的事。其形成的标志是天启、崇祯年间，宁波商人在北京设立“鄞县会馆”。

北京右安门内郭家井二号四明会馆，有旅京宁波同乡公益会于民国13年（1924年）所立的《四明会馆碑记》，碑文中称：鄞县会馆，“相传为明时吾郡同乡之操药材业者集资建造，以为死亡停柩及春秋祭祀之所”^⑭。会馆系同乡组织，其宗旨为“以敦亲睦之谊，以叙桑梓之乐，虽异地宛若同乡”^⑮。从四明会馆碑记的记述中可以看出，当时的鄞县会馆属于以商人为主的同乡会馆。民国11年（1922年）鄞县会馆改名四明会馆，成为旧宁波府属各县旅京者同乡会馆。举行四明会馆落成礼时，宁波“同乡之旅京者多与焉，而以执工商业者为尤众”^⑯。明末宁波帮商人在外地经营活动还是零星分散的，作为在京宁波帮商人活动场所的鄞县会馆，主要是“建置义园”，“妥厥旅魂”，举办公益事业，起“敦桑梓之谊”的同乡联谊作用^⑰。

稍晚于鄞县会馆的，还有座落在北京前门外晓市大街129号的“浙慈会馆”。“浙江慈溪县成衣行商人会馆，又名浙慈馆，约在清初成立，‘光绪十六年重修’^⑱。光绪三十一年所立的财神庙《成衣行碑》记述：“经前成衣行会首，在于京师城内外，商同各铺掌柜、伙友出资，在于南大市路南创造浙慈馆。……当时成衣行，皆系浙江慈溪县人氏，来京贸易，教道（导）各省徒弟，故名曰

浙慈馆，专归成衣行祀神会馆”。以碑文看，当时的浙慈会馆属于主要事务由工商业者掌握的商人会馆。

这一时期，即明末清初为宁波商帮初始形成阶段，其主要活动地域在北京，主要经营行业是药材业和成衣行。从“会馆之设，肇于京师”^①和清初宁波籍大理卿陈心斋修葺整理鄞县会馆^②这两件事情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商帮依附于封建官僚的关系。

(2) 迅速发展阶段 清乾隆、嘉庆时期，商品货币经济有长足的发展，商业资本益形活跃，这是宁波商帮迅速发展阶段。这时宁波商帮不仅在北京的势力有所加强，还在常熟、汉口、上海等商业重镇创建会馆。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宁波商人在常熟创设宁绍会馆。《常熟宁绍会馆始末记》载：“迨清乾隆辛卯，始由叶公林春醪资置地为宜瘞所”^③。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宁波商人在号称“九省通衢”的汉口建立浙宁公所。《夏口县志》载：宁波会馆在九如桥，清乾隆庚子成立，联络同乡，维持商业。旧名浙宁公所，清宣统元年改今名。嘉庆二年(1797年)，上海四明公所建立，为“四明同乡之从宦服贾者捐资置地”所建^④。《上海县续志》载：“四明公所，在二十五保四图，嘉庆二年宁波费元圭、潘凤占、王秉刚等创募”。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宁波在关外、山东等地贸易之众商集资在上海创建浙宁会馆^⑤。《上海县续志》载：“浙宁会馆，初名天后行宫，在荷花池头。嘉庆二十四年甬商董萃记等创建”。这个时期宁波商帮所建的会馆公所，不仅叙同乡之谊，联同业之情，恤嫠赡老济贫，还研究商务，团结同乡，以维护共同利益。诚如《鄞县通志》所说：“我国民众之有团体，盖滥觞于商贾。商贾以竞利为鹄的，垄断饮羊自周已然，而同行嫉妒一语亦已为方俗口头禅。于是其中有翹楚者出，知互相倾轧必致两败俱伤也，乃邀集同业订立行规，相约遵守，俾有利则均沾，有害则共御，此商业团体之成立所以为最古也。其资力较雄

厚者或建造会馆或设立公所，以为同业集议联欢之所，公举董事柱首等掌理评议经济诸务。”这段议论，基本上可以说明当时会馆的性质和作用。

(3) 趋于成熟阶段 鸦片战争后，根据《南京条约》，宁波于1844年辟为通商口岸，英、法、美等国相继派驻领事或副领事，并划甬江北岸作为外人居留地，设立洋行。这时，宁波商人擅长对外贸易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并出现买办商人，宁波商帮迅速崛起，跻身于全国著名商帮之列。《鄞县通志》称：“至五口通商后，邑人足迹遍履全国、南洋、欧美各地，财富日增。”这个时期是宁波商帮趋于成熟阶段。

其时，宁波商帮活跃在全国各地，尤其在上海，宁波人“挈子携妻游申者更难悉数”^②。董启俊说：“上海居民中，宁波人占相当大的比数，在清末估计已达40万人”^③。宁波商帮在上海商界居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来沪经商而最有手腕和力量”的“帮口”之一^④。这时宁波商人在上海按行业分帮，分别建立各业各帮会馆。如余姚陈淦，慈溪罗秉衡、袁璠，鄞县李汉绶等创建上海北市钱业会馆^⑤；光绪十六年（1890年），在上海营业的宁波肉业帮创立诚仁堂^⑥；光绪十八年（1892年）宁郡六邑竹业帮创立同新会^⑦；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宁郡六邑马车漆业帮创立同议胜会^⑧；重修上海轩辕殿助捐各户中有宁波六邑的洋广帮、洋行帮、零剪业、兜套业和衣庄店伙。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四明公所“复于日晖港购地三十亩有奇”，广构屋宇，筑建办事室。“甬人之旅沪者最众，各业各帮大率有会，而皆总汇于公所”^⑨。

宁波商帮在北京、天津、汉口、苏州等地的势力也有进一步发展。

近代“北京的工商业，几乎完全掌握在地方行帮商人手里。如银号业、成衣业、药材业，都是清一色的浙东商人”^⑩。由原籍宁波府慈水镇的乐氏于清康熙年间（1702年）创办的同仁堂药

铺，这时又有新的发展（乐家第十代乐平泉重振同仁堂，其孙乐达仁开设达仁堂）。北京浙慈会馆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重修时“共用银一千九百五十二两三钱二分”，首事人有朱新年、冯桂心、裘熙政、陈国玺等七十三人^⑤。

近代天津“舳舻扬帆，往来交错，尽昼夜而无止”^⑥。宁波商人经营的大型帆船（俗称北头船）行驶于宁波、上海、天津间，每艘船载重量约有七、八十吨之谱，除为清廷漕运粮食外，还兼营南北货运生意。天津漕运局总办张友堂是宁波人，曾给同乡很多方便。北头船在天津闸口建有商船公所，专供北头船到达天津后集会之用，亦为宁波同乡联络之所^⑦。宁波帮和广东帮还是最早进入天津法租界设店经商的中国人。早期在法租界有名的宁波帮商店有冠生园南味店、李同益西服店（另一说是李同益呢绒店）等^⑧。这时在天津的宁波商人已为数不少，除贩运南北货物的北号庄客童承初外，宁波商帮头面人物如严筱舫（即严信厚）、叶澄衷、严蕉铭、王铭槐、叶星海等都活跃在天津商界。（编者按：关于他们的活动事迹，参阅本书《在天津的“宁波帮”》一文。）光绪年间，严筱舫、严蕉铭、王铭槐等发起将天津北门里户部街浙江乡贤祠扩充为浙江会馆。“由于宁波同乡占人数最多，所以会务领导权始终为宁波帮所掌握”^⑨。

近代汉口五方杂处，商贾辐辏，俱以贸易为业。宁波人在汉口经商亦为数不少。作为宁波商帮在汉口的重要活动场所的浙宁公所，宣统元年（1909年）重加修葺，改名宁波会馆^⑩。

光绪年间，宁波帮商人在苏州南濠大街147号也建有浙宁会馆。

这时，宁波商帮的活动范围还不只限于各大城市和商埠，在市镇也有相当大的势力。如设在南浔镇北下坝的宁绍会馆，系嘉庆中建，同治五年、光绪十六年重建^⑪。

（4）臻于鼎盛阶段 民国时期，是宁波商帮臻于鼎盛阶段。

孙中山先生对宁波商人备加赞赏，曾说：“宁波人素以善于经商闻，且具有坚强之魄力”，“宁波人对工商业之经营，经验丰富”，

“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④。《慈溪县志》也载，甬人“四出营生，商旅遍于天下”，“甚至东西南洋诸国亦措资结队而往开设廛肆”。这时，宁波商帮中新一代商业资本家已经长成，他们生长在通商口岸，从小受西方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熏陶，不少人出身于洋行买办或充当过买办，对新事物极为敏感，具有西方经商手腕。由于这批商人活跃于商界，使帮口商人的势力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宁波商帮和上海商帮替代山西商帮和徽州商帮，执全国商业、金融业之牛耳。

其时，宁波商帮在上海、汉口、天津等大商埠势力特盛。

上海总商会是一个足以控制上海金融贸易和影响全国商业的商人团体，而20世纪前半期的上海总商会基本上就是由甬籍商人组成和主持的。

汉口商界巨子也有不少是宁波商人。如在汉口商务总会中，鄞县人卢鸿沧曾任首届总理，第二、四届议董，第七、八届特别会董；蔡永基，曾任第二届议董；蔡瑞卿，曾任第九届评议会董；以上诸人都是鄞县人。汪炳生，曾任第二届协理，第三、四、五届议董；盛竹书（炳纪），曾任第五、六届协理；宋渭润（炜臣），曾任第一、四、五、六届议董，第七届会董；史晋生，曾任第二、三、四、六届议董，第七、八届会董；第九届特别会董；郑似松，曾任第二、三、四、五、六届议董，第七届会董，第九届副会长；沈宾笙，曾任第四届议董；王柏年，曾任第六届议董，第七、八届会董；以上诸人都是镇海人。秦楔卿，曾任第九届会计会董；赵典之和郑燮卿，曾任第九届庶务会董，他们都是慈溪人。

在天津商界势力最大的是广东商帮和宁波商帮。民国时期，

在商业中心劝业场一带有不少名店，都是宁波帮商人经营的^④。

二、“宁波商帮”的活动地域和经营行业

（一）宁波商帮的活动地域 从《鄞县通志》记载的旅外同乡会情况看，宁波商帮主要活动地域有上海、汉口、南京、杭州、北京、吴县（苏州）、常熟、临海、兰溪、严州（建德）、温州、长兴、无锡、盛泽、扬州、徐州、怀宁、芜湖、南昌、江陵（沙市）、应城、长沙、巴县（重庆）、厦门、汕头、青岛、烟台、郑州、大连、沈阳等地。天津虽然没有宁波同乡会，也是宁波商帮的主要活动地域。此外，一些偏僻城镇也有宁波商人，如安徽庐江“凡食用之物，多山、陕、徽、宁人开设铺户”^⑤。

宁波商帮的活动地域还不限于国内，在海外也分布甚广。宁波人有两次移居海外的高潮。《定海县志》说：“饥驱寒袭，迫而之外，航海梯山，视若户庭。光宣以来，商于外者尤众，逐年侨外人数，儿达十万”^⑥。这是第一次移居海外的高潮。另一次是本世纪四十年代末，出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和经济的原因，大批工商业实业家从上海移居港澳，或以台湾为跳板，转向南北美洲、大洋洲和西欧。目前，宁波旅居海外的华侨、华裔和港澳同胞有7.3万多人，遍布香港、澳门、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英国、西德、澳大利亚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旅居海外的宁波人中不少是工商业巨子。

（二）宁波商帮的经营行业 宁波商帮的经营行业，从甬商在沪、汉、津等大商埠的经营情况，可窥其大概。

（1）上海 宁波商帮主要活动地域在上海，旅沪经商者不下数十万人。即使在日寇占领、经济萧条的1941年，宁波人在上海经营的工商企业仍达2230家^⑦。